

浅析束皙《补亡诗》六首中的“儒道并陈”的思想特征

陈锦源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2308

摘要: 西晋士人束皙通过补写《诗经》中六首亡诗,既传承了儒家传统的政教伦理思想,如孝道、重农等,又融入了道家宇宙论,体现了“道生万物,自然和谐”的本体论观念。《补亡诗》前三首侧重儒家思想,后三首则带有道家思想色彩,呈现出“儒道并陈”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补亡诗》的具体内容,探讨了束皙思想中儒道并存的现象,并指出其思想来源既受官方儒学宣传及家学渊源影响,也与个人仕途坎坷及西晋时代玄风盛行密切相关。通过研究西晋“儒道并陈”的现象,有助于让我们深入理解西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束皙;《补亡诗》;儒道并陈

束皙是西晋较为重要的诗人、经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补亡诗》六首被萧统选入《文选》诗类卷首,是束皙最为出名的代表作,清人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写道:“束皙之《补笙诗》,皮日休之《补九夏》,白居易之《补汤征》,以为文人戏谑而不为虚称为拟作,抑亦可矣。”可见,束皙的《补亡诗》在补亡文学研究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束皙的《补亡诗》存在较为明显的儒、道两种思想特征,通过探究束皙《补亡诗》中“儒道并陈”的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晋时期的新变化。本文试图从“儒道杂陈”的现象概括和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两方面展开论述。

1 《补亡诗》中的儒道思想

束皙所作的“补亡诗”乃《诗经》305篇之外的六首“亡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首。这六首诗在《诗经》中只存其名而无其辞,但《诗序》对每一首诗都作了小序以明其义,这些小序对创作主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并且大多都限定在儒家传统思想范围之内。补亡类诗一般与原诗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诗经》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补写《诗经》更应该集中反映儒家思想,然而束皙的《补亡诗》却写得有即有离,这就值得探究。

《诗序》对《南陔》和《白华》的解释是:“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可见《南陔》与《白华》的题旨都是弘扬孝道。而孝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束皙在创作的过程中也非常忠诚地遵从这一诗旨。《南陔》以“循彼南陔,言采其兰。”起兴,表达要在“敬”

与“养”两方面侍奉父母,最后以“养隆敬薄,惟禽之似。”陈述了“敬”重于“养”的儒家传统孝道观。《论语》中曾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孔子论孝,将“敬”放在了“养”之前,《南陔》正是这种孝道观的体现。《白华》一诗强调了自洁在奉亲敬长中的重要性。说明“自洁”的具体做法是“竭诚尽敬,亹亹忘劬。”这两首诗的确都是对儒家传统孝道思想的传承与弘扬。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评价:“束皙作《补亡诗》,于《南陔》《白华》二篇,每以为言。《南陔》曰:‘养隆敬薄,惟禽之似。’《白华》曰:‘竭诚尽敬,亹亹忘劬。’可谓得孔子之旨矣。”

《华黍》体现的则是儒家的重农观,《诗序》曰:“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束皙从“时和”与“岁丰”两个方面展开,陈述只有农事顺利才能政治稳定,“蓄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烛阳明,显猷翼翼。”这也 very 符合儒家一贯的重农治国思想,《孟子·梁惠王上》提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种“制民恒产”的思想在西汉之后逐渐演变成了“以农立国”,而《华黍》中体现的正是束皙对儒家传统的重农思想的传承。

《南陔》《白华》《华黍》三篇均体现了束皙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承与弘扬,然而到了《由庚》《崇丘》《由仪》三篇时,思想内容则带有一定的道家思想色彩。《诗序》曰:“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仪也。”从《诗序》的介绍看,这

三篇本身都是描写自然万物的。《诗经》中直接描写自然景物的也有不少,例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但《诗经》中全篇单纯状物的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借状物起兴以写人事或是以抒己情。束皙所作的这三篇补亡诗则是借描写自然万物来阐述“道生万物,自然和谐”的道家宇宙论,这与《诗经》原典精神有所不同。《由庚》开篇以“荡荡夷庚,物则由之”直接描述万物皆生于道,“道之既由,化之既柔”则说明万物皆由此道自然和谐地生发开,于是草木、鱼兽、四时、星月、五是、六气皆由此而生。这种“道生万物”的思想显然来源于《老子》的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宇宙论思想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而如果说《由庚》所论述的是“道可生万物”,那《崇丘》所论述的则是“万物皆可归于道”。《崇丘》末章:“资生仰化,于何不养。人无道夭,物极则长。”李善注曰:“资,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物尽其性,咸生长也。”“②《老子》曰:‘终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末三十而死曰夭,言无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长。’言物极则归长也。”这是直接将老子思想运用于《补亡诗》的创作中。最后的《由仪》则描述的是万物遵循“道”的发展后将会是多么和谐。《由仪》前三章分别描写了君子、鱼鸟、宾主如何升平和谐,而这一切都要归于万物各得其所,顺其“自然”。尤其是“时之和矣,何思何修”一句,李善注曰:“时既和平矣,何所思虑,何所修治。《易》曰:‘天下何思何虑。’王弼曰:‘一以贯之,不虑而尽也。’《庄子》:‘老聃曰:至人之于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修之为?’”可见这一句带有明显的道家清静无为思想。

总的来说,《补亡诗六首》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弘扬孝道之作,《南陔》与《白华》即属此类。第二类是重农之作,即《华黍》所表现的内容,主要写农业的重要性和农业与政治的关系,也偏向于儒家思想。第三类是体悟道玄之作,《由庚》《崇丘》《由仪》三篇则属此类。《由庚》描述的是“道可生万物”,《崇丘》

描述的是“万物皆可归于道”,《由仪》则描述的是万物都遵循自然之“道”以后将会是多么和谐,这三篇作品对宇宙本体的探讨,是原始《诗经》中所没有的内容。

2 出现“儒道并陈”的缘由

通过《补亡诗》可以看出,束皙的思想具有“儒道并陈”的特点。这种“儒道并陈”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这两种在正始时期对抗似乎还颇为激烈的思想到了西晋时期则开始走向了缓和,要想搞清楚这种缓和出现的原因,我们首先需要分析清楚束皙儒道思想的来源。

2.1 束皙的儒家思想来源

束皙的儒家思想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官方宣传,二是家学渊源。

首先,从官方宣传来看,西晋以孝立国,晋武帝自登基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尊儒的官方态度。《晋书·武帝纪》载:

六月甲申朔,诏曰:“郡国守相……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

“劝务农功”可见西晋官方对农业的重视,“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可见西晋官方对孝道的重视,这二者在束皙的《补亡诗》的《南陔》《白华》《华黍》三篇中都有体现,而“勉励学者,思勤正典”也可将其看作束皙补《诗经》之亡诗的官方倡导。

其次,从家学渊源来看,束氏是个典型的受儒学思想浸淫的家族。束皙的先祖疏广以熟读五经闻名,曾被汉宣帝任命为太子太傅,授太子儒家经典。束皙的祖、父历仕汉、魏,其时玄风未畅,二人从小必也是读儒家经典长大。束皙本人也不例外,束皙曾少游太学,并受到当时的太学博士曹志赏识,《晋书·束皙传》载:“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后来束皙又以孝廉闻名乡里,《晋书》又载其著有《五经通论》,可见束皙从小必然也熟读儒家经典。这些也就成为了束皙想去创作《补亡诗》以及能够创作《补亡诗》的原因之一。

2.2 束皙的道家思想来源

束皙的道家思想可以从他个人的现实经历和当时的时

代风气两方面分析。

从现实经历看,束皙的为官之路走得相当坎坷,或许也因此,他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并没有那么深重。束皙年少成名,从太学还乡里后便被察孝廉,举茂才,但他当时选择“皆不就”。后因束皙之兄束瓛娶石鉴之女又弃之,石鉴对此怀恨在心,于是暗示州县官府不得征辟束氏兄弟,束皙不得不因此长期闲居在家,直到石鉴去世,束皙才因为作品《玄居释》被张华赏识,从而进入仕途。早期仕途上的不得志使束皙不得不暂时放下对功名的追求,转而从道家思想中为自己寻找心灵的依归,其宣扬“淡泊无为”的《玄居释》即作于此时。而束皙入仕以后也并没有平步青云,他历任中书掾、贼曹属、佐著作郎、博士、尚书郎,最高仅官至六品。晋武帝死后,西晋朝局混乱,元康元年(291年),八王之乱拉开序幕,许多士人,甚至是名士都因为站错队而惨遭屠戮,例如当时的太保卫瓘与其子卫恒便是死于楚王司马玮之手。束皙曾与卫恒交好,“闻恒遇祸,自本郡赴丧”,还作有《吊卫巨山文》。在赵王伦篡位后,曾征束皙为记室,束皙却选择称病还乡,从此再未出仕。可见,政治上的不得志与想在乱世中明哲保身的期望,让束皙作为一个儒家的士大夫,却有着较为明显的道家“遁世”的色彩。

此外,当时的时代风气也影响了束皙。道家思想在正始士人的诠释和整理下一变而成为玄学思想,并在西晋流行于上层士人中,《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这种清谈并没有使道家思想在深度上更进一步,而只是作为一种流行的知识成为士人们热衷表达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束皙要想得到上层士人的青睐,就必须将玄学思想融入到诗文创作中,其闲居在家时所作的《玄居释》就是这一实践的典型表现,《玄居释》在篇尾点出的“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和“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都是具有鲜明的道家色彩的内容。束皙也因为《玄居释》而受到张华赏识,得以入仕。因此,《补亡诗》中出现道家思想或者说玄学思想恐怕也是受当时的时代风气影响。

3 结语

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评价西晋文人

创作时总结:“儒玄结合,柔顺文明是西晋文人的人格模式,它的基本表现是谨身守礼、儒雅尚文、谦柔自牧、宅心玄远、通达机变。这是一种折中的、调和色彩很浓的人格模式。”

束皙在《补亡诗》六首中所呈现出的思想特征,既有官方推崇儒家思想的影响,又有当时文坛玄风大畅的痕迹,这恰恰就是“儒玄结合”的典型反映。而这种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同一篇或者同一组诗歌中出现,甚至在典型的儒家诗歌题材中表达道家思想的现象,体现的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正在从正始时期的紧张对立到西晋时期逐渐走向缓和。虽然这种“名教”与“自然”的缓和只是暂时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晋短暂一统的结果,随着西晋王朝的崩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又会重新陷入紧张之中,但是我们仍能通过束皙的《补亡诗》六首,窥见西晋国家稳定时期,中下层士人儒玄结合的思想世界的一角。

参考文献:

- 1.[唐]房玄龄等著:《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 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
-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 4.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 5.[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 6.钱志熙著:《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7.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1995年版;
- 8.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9.[清]严可均著:《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 10.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
- 11.刘悦著:《束皙集校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12.高金霞著:《束皙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13.赵婧著:《论束皙的<诗经>学及其<补亡诗>创作》,《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